

因為疫情，歐洲哲學家們吵翻了！

王悅，南風窗 2020 年 4 月 1 日

78 歲高齡意大利哲學家吉奧喬·阿甘本迎來了他人生的“至暗時刻”。

這不僅是因為意大利在短短一個多月內，成為了整個歐洲新冠肺炎疫情最嚴重的國家，而這種疾病對於 65 歲以上的老人來說有可能是致命的。更重要的是，阿甘本處在了歐洲哲學界近年來最大的一場論戰的中心。

阿甘本在哲學界的地位備受尊敬，但他對疫情的思考卻引發了幾乎整個歐洲哲學界的反對，即便是其朋友也難以認同。

在這場論戰中，哲學家們關心的是歐洲的疫情到底有多嚴重？各國政府的防疫措施是過於嚴厲還是過於寬鬆？疫情過後，歐洲還能夠恢復往日的樣貌嗎？疫情還在醞釀著一種尚不可捉摸的政治後果？

1 無端的“緊急狀態”

自從 1 月 31 日羅馬出現首 2 例新冠肺炎病例，意大利政府就宣佈進入為期半年的“國家緊急狀態”，並暫停了所有往返意大利和中國大陸及港澳臺的航班。在此後的 20 天裏，意大利境內僅新增了 1 例本國籍病患。

好景不長，2 月 21 日後，北部倫巴第大區突現社區傳播，確診病例猛增，甚至在第二天就出現首例死亡病例。

顯然，“國家緊急狀態”已經不足以應付疫情的突襲。意大利政府在 2 月 22 日宣佈對密集出現疫情的北部倫巴第、威尼托兩大區 11 城鎮的約 5 萬居民實行隔離檢疫，並在該區域內實施了多項管制措施，包括禁止公眾集會，取消一切體育、宗教活動，關閉學校、酒吧等。此後，官方還增派了警察在隔離區巡邏，並派遣軍隊介入隔離區的檢查站。

論戰的導火索是 2 月 25 日，阿甘本在《宣言報》和“任意”出版社的博客上刊登的一篇社論，題為《由無端的緊急狀態帶來的例外狀態》。但讓老哲學家感到擔憂的，並不是疫情的蔓延，而是意大利政府採取的強硬防疫措施。

阿甘本指責意大利政府採取的緊急措施“瘋狂、不合理且毫無依據的”，因為意大利國家研究中心的聲明顯示出，疫情並未像媒體和政府官方渲染的那麼可怕。

在阿甘本看來，政府以“衛生與公共安全”為名的法令條款“模糊且不確定”，卻會讓懸置法律效力的“例外狀態”合理擴散到意大利所有大區。他更擔心當人們習慣了恐懼，這種恐懼會轉換為一種對安全的渴望，人們會為了滿足這種渴望自願放棄個人自由。

也許是因為阿甘本發表這篇社論之時，歐洲疫情的嚴重程度的確尚不明朗，阿甘本的判斷是否正確也無從知曉。

實際上，在意大利，並不只有阿甘本對政府的嚴厲措施懷有抵觸情緒。政府重啟“國家緊急狀態”，無疑令意大利人苦澀地回憶起 1970 年代當局為鎮壓“紅色旅”等極左團體動用“莫羅法”製造的“白色恐怖”。

兩天之後的 2 月 27 日，阿甘本的“老朋友”、法國哲學家讓-呂克·南希首先發難，他在“二律背反”網站上發表題為《病毒性例外》的簡短回應文章。論戰的序幕拉開。

身處法國的南希也許感受到了疫情的緊迫。就在這一天，法國的疫情迎來了第一個高峰，當日新增 20 例確診病例。**南希提醒“老朋友”注意，我們有疫苗應對“常規”流感，但是還沒有疫苗可以對抗新冠病毒。這個差別會使得冠狀病毒有更高的致死率。**

至於“例外狀態”，南希則認為不能僅僅歸咎於意大利政府，因為“這種例外實際上在這樣一個世界中成了一種規則”。換句話說，**真正有益的政治反思應當把矛頭指向全球化，而“政府只是可悲的執行者”。**

事實上，據媒體報道，意大利政府的防疫並非如鐵桶一般，而是漏洞百出，造成了一種“封鎖歸封鎖，活動歸活動”的態勢。

對哲學家馬西莫·卡奇亞裏而言，真正的“例外”是這種完全混亂的氛圍。他在 27 日接受《新普利亞日報》的訪問時感歎：“如果俱樂部照常開放，那麼，在沒有新冠病毒染病記錄的地區封閉學校的意義何在？”

與阿甘本對政府限制自由的擔憂形成鮮明反差，卡奇亞裏抱怨政府“脆弱且無腦”，只能被動遵循孤立主義的邏輯。

3 月 1 日，意大利政府和議會通過了《防控新冠疫情法令》，將意大利分為“紅區”、“黃區”和安全區。3 月 4 日，意大利首次出現單日死亡病例過百。

與此同時，阿甘本的文章引發的爭議也越來越大。越來越多哲學家加入到批判阿甘本的行列。“二律背反”網站則成為了學者們論辯的主戰場。“二律背反”是 18 世紀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提出的哲學基本概念，指雙方各自依據普遍承認的原則建立起來的、公認為正確的兩個命題之間的矛盾衝突

創辦《歐洲精神分析期刊》的意大利哲學家塞吉奧·本維努托 3 月 5 日發表文章，題為《歡迎來隔離》。（他拿自己的名字開了個小小的玩笑，因為在意大利文中，本維努托的意思就是“歡迎”。）

雖然**本努韋托**把阿甘本稱作“我最喜歡的哲學家之一”，但是他並不認同阿甘本。**他認為，阿甘本把政府採取的措施看成是“統治階級暴虐本能”的結果的觀點既不切實際，也容易助長陰謀論。**

而且，人們面對未知病毒的恐慌並不是“非理性的”。在當前，政治權力選擇製造恐慌，以鼓勵人們隔離病毒可能是最好的辦法。

2 阿甘本的“至暗時刻”

3 月 8 日，來自印度的兩位年輕哲學家沙吉·莫漢與迪維亞·德維迪也向阿甘本宣戰。

兩人發表《被遺棄者的共同體：回應阿甘本與南希》，大致認同南希的反駁。他們認為，與“例外狀態”相對的“普通狀態”只存在于阿甘本的想像中。比如在印度就不存在處在普通狀態的人，幾乎所有人都因屬於特定種姓而可以稱作是“例外”的。

此時疫情已急轉直下，包括米蘭、威尼斯、帕爾馬等在內的 11 座城市，被意大利政府宣佈“處於隔離檢疫的警戒狀態”，而意大利單日新增確診數卻還是突破了 1500 例，累計確診病例超過 1 萬。

總理孔特在 3 月 10 日凌晨簽署全境防疫法令，使得意大利成為全球首個為應對新冠疫情，在全國範圍實施封閉政策的國家。

但是阿甘本並未動搖。他在意大利封國的第二天 3 月 11 日發表題為《論感染》的文章再次申明立場，想要揭示“傳染”這個醫學概念的生命政治學意涵。

阿甘本引用了曼佐尼描述 1630 年代米蘭大瘟疫的小說《約婚夫婦》（《約婚夫婦》是意大利十八世紀著名作家曼佐尼代表作，其地位在意大利文學史上僅次於但丁的《神曲》、彼特拉克的《抒情詩集》和薄伽丘的《十日談》，是一部以平民為主人公的長篇歷史小說），譴責意大利政府的措施“實際上把每個人都變成了潛在的塗油者”。**他擔憂這些防疫措施有可能導致的“人際關係的惡化”。**

哲學家洛可·隆奇在 14 日發表的《病毒的美德》中對防疫措施做了與阿甘本截然相反的解讀。**與人保持距離並不是對自由的限制，因為真正的自由是“在特定情況下做必須做的事情”。**隆奇也不像南希那樣認為今天只存在“例外”，而是根本不存在“例外”。

“病毒顯示出，整體必然包含在部分中，而在自然中沒有任何自治的領域可以構成‘例外’。”有些人面對疫情蔓延而不願有所行動，正是因為他們愚蠢地相信自己的“例外”。

真正讓阿甘本備受打擊的，是哲學家兼記者保羅·弗洛雷斯·達凱斯在《微型巨人》雜誌發表的文章。

這篇於 3 月 16 日刊出的文章《哲學與病毒：阿甘本的幻覺》言辭尖銳，達凱斯顯然沒有阿甘本的朋友和崇拜者那麼客氣。他嘲諷阿甘本“偏愛迷信的傳播與神學的反芻，偏愛精神上的娛樂和反科學的驅魔，偏愛平庸的抱怨和自戀的妄想”。

因為阿甘本的文章“旨在證明並沒有傳染病，而只有傳染觀念的傳播”。**達凱斯斷言，阿甘本提供的是一種“糟糕的哲學”，在邏輯手冊上需要添加上“阿甘本的失敗”。**

達凱斯的言辭徹底惹惱了阿甘本。老哲學家在第二天 17 日發佈聲明：“一位意大利記者此前發揮自己的職業優勢，誤解和扭曲了我對一些倫理學困惑的反思”。但聲明的大部分內容，只不過重複了他在前兩篇文章中的觀點。

顯然，阿甘本並沒有要修正自己的觀點的意思。他只是**要強調自己擔憂的不只是當下，還有瘟疫結束之後，我們該如何共同生活。**

不過，形勢已經對阿甘本極為不利。本努韋托直接把第二篇文章定名為《忘記阿甘本》。他無疑是模仿了 43 年前法國學者讓·鮑德里亞批評福柯的文章《忘記福柯》。

阿甘本的另一位“老朋友”、斯洛文尼亞哲學家斯拉沃伊·齊澤克也在《溫情脈脈的野蠻行徑乃是我們的宿命？》中表明，“雖然對阿甘本充滿敬意，但我不同意他的見解”。他認為，保持身體上的距離是出於對對方的尊重，而不一定會“把人們分割開來”。

3 埃斯波西托與南希：“生命政治”之爭

唯一站出來為阿甘本辯護的是哲學家羅貝托·埃斯波西托。

2 月 28 日，他為《共和報》和“二律背反”網站各寫了一篇文章，分別題為《黨派與病毒：生命政治當權》和《“治”到最後》，主要是為了回應讓-呂克·南希。

實際上，埃斯波西托和阿甘本的哲學工作有一個共同關心的問題：“**生命政治**”。它成了這次論戰的另一個焦點。

“生命政治”的概念是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提出的，指涉 18 世紀西方社會出現的一種將人民當作生物性人口加以計算和調節的治理技術。這種治理技術結合了人口學、統計學、公共衛生和都市計劃等新興知識，政治權力從此不再通過死亡的威嚇施展，而是專注於養育國家的人口素質。

阿甘本在福柯的基礎上提出了“神聖人”和“赤裸生命”的概念，用來表示“例外狀態”下被政治棄置的人的處境。埃斯波西托則敏銳地意識到，南希對阿甘本觀點的疑慮源自於他對“生命政治”概念由來已久的懷疑態度。

埃斯波西托認為，“生命政治”在現代社會的應用有目共睹，而南希所使用的“病毒性”一詞本身就表明生命政治的污染跨越了政治、社會、醫療和技術多種語言。

埃斯波西托同意阿甘本，雖然長時間以來，緊急法令都被用以應對疫情，但卻“並非絕對必要”。**將政治推向例外狀態，終究會損壞民主國家所珍視的權力平衡。**

不過，埃斯波西托的觀點要更為折中。他也像卡奇亞裏一樣意識到，當下**意大利政府表現出的與其說是極權主義，不如說是“公共機構的崩潰”。**

在阿甘本發佈《聲明》的同一天 3 月 17 日，讓-呂克·南希再次出手。這次他直接表達了他對“生命政治”及其狹隘視野的反對。就在前一天，法國政府也繼意大利之後宣佈了迄今最為嚴厲且徹底的“封禁”措施。

南希在視頻中朗讀了自己的長文《一種太人性的病毒》，他更加肯定地宣稱，“作為一種瘟疫，冠狀病毒從各個方面來看都是全球化的產物”。各個國家的“例外狀態”必須結合人類的整體處境來看，否則就只會讓人陷入陰謀論的狂想。

“生命”和“政治”兩者都呈現出自身的複雜性，令人難以掌控，這使得談論“生命政治”顯得非常“可笑”。

危險並非來自於某種外在的權力技術，因為新冠病毒揭示了問題的源頭出在我們自己的“生活條件，食品品質和環境的有毒性”。借用尼采的說法，這些內在於我們的危險並非超越於人性，而是“太過”人性。

儘管如此，“生命政治”學說還是為哲學界廣泛接受。比如，德國韓裔哲學家韓炳哲在 3 月 23 日刊載於德國《世界報》的文章中，就仍然積極使用阿甘本的“例外狀態”來分析疫情。

然而，韓炳哲提醒我們，關閉邊境的主權模式已經過時，政府對信息的全面掌控更需要我們警惕。

4 “我們是否值得拯救？代價是什麼？”

3 月 24 日，法國《世界報》刊登了與處在風暴中心的阿甘本的訪談。這篇訪談給持續了近一個月的哲學論戰畫上了象徵的句號。

阿甘本說，作為一個哲學家，他從未想要介入科學界之間關於流行病的討論。他感興趣的是這場疾病所造成的倫理與政治上的極其嚴重的後果。

他想要強調，所謂的“例外狀態”早已成為一種常態，人們在已習慣於生活在一種永久危機的狀態。而現行的緊急措施的主要依據是認為“敵人來自於外部”而不是“敵人來自於內部”，沒有什麼比這種觀念更能破壞人類的團結。

阿甘本之所以是令人尊敬的哲學家，是因為他提出了有價值的問題。印度哲學家沙吉·莫漢與迪維亞·德維迪將這個問題表述為“我們是否值得拯救？代價是什麼？”

在某種程度上，阿甘本是對的。他指出了封閉的民族國家在應對疫情上的局限。因為此前，意大利和法國最為果斷的措施是對外鎖國，卻無力處理內部的混亂。

法國哲學家阿蘭·巴迪歐 26 日的文章也揭示了歐洲國家在應對疫情上表現出來的矛盾：“各國試圖在地方層面控制病毒擴散……而瘟疫卻是跨地區的”。現實很快就證明了，面對全球性的疫情，歐洲並不是一個可靠的避難所。

但是阿甘本畢竟提供了一條糟糕的出路。他一貫主張的“無為而治”的政治理想放在疫情之下的確顯得太不合時宜。不過，我們不應怪罪老阿甘本，甚至也不應當指望任何一位哲學家給我們最終的答案，因為哲學上的所有問題都是朝向歷史敞開的。

阿甘本的“老朋友”、讓-呂克·南希也已經 80 歲了。他回憶起近 30 年前，醫生認為他需要安裝一個心臟支架，而阿甘本則是極少數建議他不要聽醫生的人之一。“如果我聽從他的建議，我可能那時很快就死了。”

南希則想要表達他對“老朋友”的寬容，畢竟“誰都可能犯錯”。至少“老朋友”的敏銳和熱心是當作“例外”來看待的。